

二十世纪《淮南子》研究

杨 栋 曹书杰

摘要:《淮南子》内容丰富,体系庞大,20 世纪的学人从各个方面对其展开了不同层次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在学术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尝试从具体的史料分析和归纳总结中,客观地展现出《淮南子》研究的时代特色和鲜明的自身特点来,希望为未来《淮南子》的研究寻找新的视野、开拓更宽广的学术平台。

关键词:《淮南子》; 二十世纪; 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 B23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8)01-0078-11

《淮南子》立意高远,结构谨严,文章大气磅礴,可谓一部绝代奇书。其“牢笼天地,博极古今”^①的思想体系和精深的内涵,成为先秦及西汉黄老道家学派不朽的殿后之作。它对西汉前期道家思想系统而详尽的总结,是研究黄老思想极其宝贵而丰富的资料。它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对先秦百家之学一次大规模地融合与反思。它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宇宙生成论,反映了汉代道家的天人之学,它以唯物的发展的眼光考察历史,得出了许多朴素的接近于唯物史的观点,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安邦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淮南子》总结了先秦科学思想与科技成果,在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农学、医学、养生学、军事等许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著。

正是由于《淮南子》博大的体系,丰富的内容,深邃的哲理,灿烂的文采,20 世纪的学人从哲学史、文学、伦理、认识论、逻辑、教育思想、医学、法律、地理及文本考释等方面展开了不同层次的研究,论文不下二百篇,专著亦有十几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把 20 世纪的《淮南子》研究作为 20 世纪思想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迄今为止相关论文有于大成的《六十年来之淮南学》、陈丽桂的《淮南子研究八十年》,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尚有欠缺,更未将其置于整个 20 世纪的学术思

想中给予整体的把握和内部理路的探析。因此,本文尝试对 20 世纪的《淮南子》研究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希望能考察出 20 世纪《淮南子》研究演进的过程,总结相关的特点和规律。

同时,对 20 世纪《淮南子》研究给予关照,也是对“学术嬗变”这一契机的把握。陈平原先生曾指出:晚清那代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术史,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②。同样道理,20 世纪末的中国学界,重提“学术史研究”,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因此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与其息息相关的“20 世纪中国学术”。所以,“二十世纪《淮南子》研究”既是一次方向感的把握,也是对百年来淮南子研究内部规律的一次探寻。“鉴往可以知今,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即深藏于对往昔的回顾之中”。^③站在学术史的角度回观 20 世纪的《淮南子》研究,也许更容易获致理性的通明。

总体来说,20 世纪的前五六十年,学者对于《淮南子》的研究,大致仍步趋清儒,着重于文字上的笺校义释以及版本注本的考订等传统的考据学范畴。六七十年代以来,新的学术范式已经形成,《淮南子》义理方面的研究成为主流,学者从哲学、文化学、文学、伦理学等各个角度展开研究,学术论文、专著日渐增多,研究深度不断加强。

① 刘知几《史通》,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291 页。

收稿日期:2007-10-15

作者简介:杨栋(1982—),山东郓城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07 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上古文学与传说、古典文献学。
曹书杰(1954—),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上古传说与先秦文献。

②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2 页。

③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1 页。

一、《淮南子》的文献研究

胡适在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序中说:《淮南子》“其书作于汉代,时尚修辞,今观许慎、高诱之注,知当汉时已有注释之必要。历年久远,文义变迁,传写讹夺,此书遂更难读。中世儒者排斥异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绝代其书,沉埋不显。迄乎近世,经师旁求故训,博览者始稍整治秦汉诸子,而淮南王书,治之者尤众。用力最勤而成功较大者,莫如高邮王氏父子;德清俞氏间有创获,已多臆说矣;王绍兰、孙诒让颇精审,然所校皆不多。此外,如庄逵吉、洪颐煊、陶方琦诸人,亦皆瑕瑜互见。计而百年来,补苴校注之功,已令此书稍可读矣。”^①晚清民国以来,学者在清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书进一步整理研究,包括成书情况的考查、版本的考辨、笺校注释的完善以及辑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下面即从上述几个方面对20世纪《淮南子》的文献研究给予一定地总结。

(一) 成书时间与写作背景

《淮南子》成书时间可确定为汉武帝刘彻建元二年,即公元前139年。但此书始作于何时,历经多长时间,后世学者仅能以揣想之词言之,更无定论。

近年来对《淮南子》写作时间论之较详的有两家。一是牟钟鉴先生,他认为“自平息七国叛乱到建元二年这十多年间,政治上较为平静,《淮南子》的写作时间大约就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段,完成于刘安入朝前夕。”^②二是吴光先生,他说:“《淮南子》的成书时代,史无明载,但从《史记》、《汉书》有关记载及高诱《淮南子叙》看,《淮南子》很可能是景帝时写成,到武帝时才献上。”^③吴氏此说实本于张岱年先生所言:“淮南王刘安召致宾客,写成《淮南内书》。这书可能是景帝时写成,武帝时献上。”^④

熊礼汇《〈淮南子〉写作时间新考》考定《淮南子》的写作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始于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之后,成书于建元二年冬十月之前。其立论的主要依据有二:一是《淮南子》书中内容所涉及的时事最迟者发生在建元元年冬十月;二是从《淮南子》的思想倾向和西汉前期政治思想情况来看,刘安主编其书是急于在建元二年冬十月入朝献书,其目的是要尽快为执政伊始的武帝提供一套以黄老道学为思想基础的治国治身之术。^⑤

日本学者金谷治氏在其《淮南子之研究》的第二节中,认为“把《内篇》新出’,马上与今日的二十篇的成立连结在一起,不太適切。今本应看作一直到淮南王之卒年(前121

年),逐次书写,最后由《要略》所统一的,要妥当些。”^⑥

概而言之,《淮南子》成书于汉初。这一时期,学者们多以道家思潮笼而统之,但实际上它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思想取向,有以崇尚清静无为、安集百姓为中心的社会取向,有以韬晦之术全生保身为中心的个人取向,有以阴谋决断权势策划为中心的策略取向,即“在以实际政治活动为中心的‘黄老’派之外,另有以个人‘全生保身’为中心,而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派别存在,其中又分为纯粹遵守无为自然者,为求保身而积极行动不惜采用权谋者,以及注重实际的养生而接近神仙家者”。^⑦

对《淮南子》的写作背景作系统的研究,实有利于更好地解读该书。徐复观在其《两汉思想史》中,从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两方面给予了探讨:刘安在帝室中,是两世(高祖、文帝)含冤的一系,刘安自身及其宾客们都有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以及随危机感而来的无可奈何的心绪都反映在《淮南子》文本里。

关于刘安作《淮南子》的意图,学界有两种看法:一为为政争服务;一为著书立说。

持第一种看法的人以侯外庐为代表,^⑧侯氏的研究有其精彩的地方,但有“阶级性”渗透在里面,这与五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和学术思想有相当的直接关系。持著书立说看法的学者主要是任继愈。^⑨

我们认为刘安主持写作《淮南子》的目的,是为了总结汉初以来统治阶级的治国理论,归纳治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试图兼容先秦以来各家学说的精华,构建合乎其治国理想、适应时代需要的治国方略。其“旨近老子”可以说是反映了文帝、景帝及窦太后主政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刘安并不是完全被动地迎合、顺应当时的思想趋势,而是自觉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思想倾向。在编纂《淮南子》的过程中,他既选择了信奉道家学说的作者,又吸纳了儒生进入写作集体;既对先秦以来的各家学说有所批评,而又俱有所取。

(二) 版本及考辨

《淮南子》有二十一卷本和二十八卷本之别。二十一卷本见于《汉书·艺文志》:“《淮南内》二十一篇。王安。”^⑩《汉书·淮南王传》称“作为《内书》二十一篇。”^⑪《淮南子·要略》有言:“故著书二十篇”^⑫,是不含序言性质的《要略》。以后的《隋书·经籍志》题为《淮南子》二十一卷。《旧唐书·经

① 胡适《淮南鸿烈集解序》,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

② 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第160-161页。

③ 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6页。

④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第106页。

⑤ 熊礼汇《〈淮南子〉写作时间新考》,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第104页。

⑥ 转引自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

⑦ 金谷治《汉初道家的派别》,《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34页。

⑧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4页。

⑨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6-248页。

⑩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1741页。

⑪ 班固《汉书》第2145页。

⑫ 刘安《淮南子·要略篇》,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9年,第707页。

籍志》著录,题为《淮南商诂》二十一卷。《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皆著录,亦称《淮南子》二十一卷。

二十一卷本流传久远,目前保留较早的是北宋本,为刘沔生抄本。二十八卷本,是把《原道》、《储真》、《天文》、《地形》、《时则》、《主术》、《汜论》七篇分为上下,成二十八之数。此本最早为明英宗正统十年刻《道藏》本,入《道藏·太清部》八百六十三册至八百六十七册。

道藏本,为历代学者所推重。王念孙曾说:“余未得见宋本,所见诸本,惟《道藏》本为优”。^①杨树达则谓,如以道藏本为底本,后代版本的许多错误“可不改而自改”。^②吴承仕、吕传元、陶鸿庆诸人,校理甚勤,创获颇多。

对《淮南子》版本或注本进行考辨的论文主要有张严《〈淮南子〉注家疑似及版本得失评议》、吴则虞《〈淮南子〉书录》、张严《〈淮南子〉二十一卷论次得失评议》、郑良树《〈淮南子〉传本知见记》、于大成《刘绩本〈淮南子〉出于藏本考》、其中吴则虞的《〈淮南子〉书录》对二十八卷本和二十一卷本异同得失,撮述较详。

另外,严灵峰《先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中有《淮南子知见书目》,将其所见《淮南子》相关书目搜罗殆尽,并注明各书存疑和版本情况,可资参考。^③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四针对《四库总目》评述《淮南子》的不妥之处,旁证博引,详加辨析,可取之处亦复不少。^④

(三) 笺校和辑佚

晚清民国以来,学者在清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淮南子》进一步订讹补阙、笺校注释。其间学者辈出,或措意于原文,或留心于训说,各有发明。如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刘家立《淮南集证》、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于省吾《淮南子新证》、杨树达《淮南子证闻》、马宗霍《淮南子高注参正》、张双棣《淮南子校释》、何宁《淮南子集释》。

上列八种,各有创见,多为学界所称。其他还有金其源《读淮南子管见》一卷、沈德鸿《淮南子选注》、吕传元《淮南子校补》一卷、陈准《淮南子札记》、王澐《读淮南子记》、向承周《淮南校问》、胡怀琛《淮南集解补正》一卷、张纯一《淮南子评注》、谭戒甫《淮南一得》、王叔岷《淮南子校正》、刘殿爵《读淮南鸿烈解校记》、阮廷焯《淮南子札迻》、郑良树《淮南子校理》七卷、于大成《淮南子校释》等,其中亦颇多发明之处。

另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如唐莉的《〈淮南子〉高诱注献疑》、傅亚庶的《〈淮南子·时务篇〉“赏有功”辨正》、许匡一的《〈淮南子〉校注献疑》、马建智的《〈淮南子译注〉辨误》、李鹏举的《〈淮南子·天文训〉“太昭”说再探》、许学东的《〈淮

南子〉校勘一则》、许匡一的《〈淮南子·兵略训〉今译指瑕》等文章亦颇有见地。

此处所说“辑佚”有两层含义:一为淮南子对先秦佚书的辑佚价值,一为各家对《淮南子》佚文的辑集。兹分述如下。

《淮南子》一书,杂采先秦诸家的史料,编辑成书,因而也保存了不少各家的引文,在先秦书籍大量佚失的情况下就更显得有一定的价值。为淮南文注出处者,清有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日本则有岛田翰之《古文旧书考》。民国以来,学者从此事者,杨树达之《淮南子证闻》中,颇有涉及,其余则有麦文郁《淮南子引用先秦诸子考》,阮廷焯《淮南子引用先秦诸子佚文考》。淮南出处之未明者犹多,对其详加考证,并辑佚成文,细加勘校,实为有功学术,惜学界鲜有人从事之。

《淮南子》自汉初成书流传至今,历时久远,其间文本的佚、脱、漏在所难免。对其佚文的辑考自然就成了学者关注的内容。清朝就有人开始对《淮南子》的佚文进行辑考。孙志祖《读书胜录》卷四《淮南遗文》略举数则,只是随笔札记,非为专治。用力于蒐集遗文者,始于王仁俊之《淮南子遗文》,在《经籍佚文》内,但遗漏尚多,吴则虞曾复为校补,附其《淮南子集释》后。刘文典亦有《淮南子遗文》之辑,载《三余札记》卷二,凡二十九条,其中四事是《淮南子·万毕术》文。另外,王叔岷昔年写《淮南子校证》时,亦辑存逸文四条。而于大成《淮南鸿烈逸文考》所得最多,且对误引者,凡有据可考皆随文注明。

以上是对《淮南子》本文的辑佚,此外,还有专辑许注者。清儒就有五家:孙冯翼《许慎淮南子注》一卷(在《问经堂丛书》内),蒋曰豫《许叔重淮南子注》一卷(在《蒋诒石遗书》内),黄奭《许慎淮南子注》一卷(在《黄氏遗书考·子史钩沉》内),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四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王仁俊《淮南许注考证》、《淮南许注异同诂校补》、《淮南许注异同诂三续》等。清末民初以来对许注作辑佚者亦有二家:易顺鼎《淮南许注钩沉》一卷。叶德辉《淮南鸿烈间诂》二卷。

通过以上对《淮南子》文献研究的综述,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的前五六十年来,学者对于《淮南子》的研究,基本上沿袭清人治学的特点,注重文字的笺校义释和版本注本的考订。而近二三十年来《淮南子》的文献研究发生了变化:从事文献研究的学人相比以前少了许多,研究的成果基本上也以单篇论文出现,或只用力于《淮南子》的某一篇,或只专攻某一个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我们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前几十年,学者在清人研究的基础上,《淮南子》的文献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顶峰,后人很难再有大的作为;其二,七八十年代以来,学人对《淮南子》的研究由考据转向了义理,由整理转向了思想文化和其他理论的研究。

① 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十五,中国书店,1985年,第44页。

② 杨树达《读刘叔雅淮南鸿烈集解》,《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224页。

③ 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第五册),正中书局,1978年,第63页。

④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四,中华书局,1980年,第825页。

可喜的是九十年代《淮南子》的文献研究出现了两部集众家之长的代表性著作，一为何宁的《淮南子集释》，一为张双棣的《淮南子校释》。

二、《淮南子》的思想研究

对《淮南子》思想的研究和解析，不仅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先秦和秦汉的思想文化，尤其是汉初道家的特殊性格，透视当时酝酿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而且可以更好的清理与叙述中国的思想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高扬中国人文精神。鉴于此，20世纪的学人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学术方法对《淮南子》的思想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淮南子》的思想研究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第一，分布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作中的一些章节中，如侯外庐《淮南鸿烈集中的子学及其学术》、胡适《淮南王书》、冯友兰《西汉道家思想的发展和官方哲学的反对派的形成》、任继愈《淮南鸿烈中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等。这些作品，除了简介刘安生平与著作等外缘问题外，或析论《淮南子》的思想体系，或主述书中几个思想大论，诸如气、道、天人关系、形神修养、道德无为、阴阳感应等。第二，见于专门研究《淮南子》的专著及学术论文中，专著如段秋关《淮南子与刘安的法律思想》、陈广忠《淮南子科技思想》、戴季《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等。但目前学术界以专著形式集中对《淮南子》某一问题进行研究的还较少，这应该是以后值得用力的地方。学术论文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涉及本体论（道、气、宇宙生成、阴阳感应等）、历史观，以及法律思想、无为理论、修养理论、乐律理论、知识理论等。

（一）所属学派的争论

《淮南子》所属学派历来争论不休，或杂家说，或道家说，或儒道融合说，今简要述之。

1. 杂家说

《汉书·艺文志》列《淮南子》于杂家。《艺文志》的作成，本于刘向、歆的《别录》、《七略》，所以，列《淮南子》于杂家者似始于刘向、歆父子。《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都列入杂家。《崇文总目》、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以及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都将它列入杂家。

近代学者沿袭杂家之说的有范文澜^①、冯友兰^②等人。侯外庐一方面承认其杂，另一方面又认为以阴阳道家之旨为超乎时空而居于百家之上^③。另外他还提出《淮南子》有宗教化庸俗化的思想，实是承袭胡适的“阴阳感应的宗教”之说。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67页。
② 冯友兰后来又把《淮南子》看作黄老道家，见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7页。
③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9页。

2. 道家说

高诱对《汉志》把《淮南子》列入杂家似有微议，他在其注解《淮南子》的《叙目》里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④直到梁启超亦认为《淮南子》当为道家。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⑤。胡适亦赞成道家说，他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⑥支持此说的还有杨树达^⑦。顾颉刚则认为“是以道家之说为主而略佐以儒家之说；又杂载许多西汉初叶的物事的。”^⑧

3. 儒道融合说

关于儒道融合说，一些学者认为，儒、道两家思想在《淮南子》中冲突、融合，并且儒家的成分在《淮南子》中更重要。当代学者徐复观先生就指出，在撰写《淮南子》的刘安宾客中，除了有一群道家学者团体之外，肯定还有一个强大的儒家学者团体，所以书中经常体现出儒、道两家思想抗争的情形，并且儒学还占据了上风^⑨。

陆玉林《论〈淮南鸿烈〉的儒道整合》也从思维框架和逻辑结构两方面，论证了《淮南子》儒道思想分野这一观点。丁原明《〈文子〉与〈淮南子〉思想之异同》亦支持这种看法。

我们认为把《淮南子》武断地归为杂家或道家都有失偏颇，其一，就二十篇中的某一篇主旨而言，的确体现了道家思想的主张，如《主术训》。但立足全书的整体思想来看，则不是这种情况，如《泰族训》显然是儒家思想的集结。其二，《淮南子》在内容上看似庞杂，其实它有自己的取舍标准，每条资料的引用都是为其所论述的中心服务的，只是由于各篇的写作出于众手，所以难免出现前后矛盾或抵触的现象，从而造成杂而无纲的样子。所以，《淮南子》是当时不同思想的宾客，在学术自由中平等竞进、集体著作的结果，也就是说淮南子是一部集诸子百家思想于一体的著作，只是道家思想占据了一定的优势而已。

（二）本体论思想

就本体论而言，学者一般认为《淮南子》中《原道训》、《俶真训》等篇有本体论倾向的规定，于是各家对《淮南子》的道展开了论述。但是《淮南子》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则存在严重的缺位，它有的只是先秦诸子遗留下的哲学思辨方法，如辩证法、因循法、原始察终法等。而就本体论，学者又在《淮南子》的“道”、“宇宙”两方面用力较多。

1. “道”

胡适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

④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高叙》第2页，《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9年。
⑤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369页。
⑥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淮南王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⑦ 杨树达《淮南子证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
⑧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2002年，第64页。
⑨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

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①

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认为《老子》书中的“道”，含义尚不够明确，《淮南子》则对“道”作了系统的说明，把它作为自己的宇宙观的最高范畴，并对《淮南子》中的“道”进行了规定：第一，“道”是无限的存在，第二，“道”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和依据，第三，“道”是宇宙的原初状态，它自然化生天地万物。^②

葛兆光先生对“道”的解读可谓深切，他认为《淮南子》中的“道”置于天、地、人之上，贯穿了自然、社会、人类自身三大领域。

张运华的《〈淮南子〉对道范畴的理论深化》认为“道”是《淮南子》一书的重要范畴，它来源于《老子》，《淮南子》通过对“道”的继承发展，深化了《老子》关于天道自然无为和道化生万物的思想，并行成了系统的自然宇宙观。^③

丁原明在《淮南子道论新探》中，以《淮南子》对“道”的论述为根据，指出其合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所言黄老之学的思想特点，当属黄老道学，并将其道论提升至宇宙论哲学的高度，与《老子》之道进行了对比。^④

《淮南子》“道”的源流何在，怎样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位。综合上述各家对《淮南子》“道”的认识，学界有两种流行的看法：其一，《淮南子》为先秦老庄道家学派的继承；其二，《淮南子》是汉初黄老新道家，即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论及的“道家”。

《淮南子》中的道家思想显然有老庄之道和黄老之道的区分，笼统地说以老庄思想或黄老思想统帅全书自然不妥。我们认为《淮南子》中的道家思想既继承了先秦道家老庄思想，同时又染有汉初“黄老思想”的时代气息。

2. 宇宙观

张岂之说《淮南子》“用阴阳学说明万物的产生和发展，把宇宙演化看成自然发展过程。但又用‘同气相感’说明天象运行与社会治乱有关，认为天象能预示人间祸福，人事能影响天象。”^⑤胡适说：“这个宇宙论的最大长处在于纯粹用自然演变的见解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一切全是万物的自己逐渐演化，自己如此，故说是‘自然’。”^⑥

先秦道家的宇宙观主要是讲宇宙的构成，而《淮南子》虽然也讲宇宙的构成，但它主要讲的是宇宙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李晓林《〈淮南子〉中的宇宙起源思想》从宇宙起源、物质演化两方面对《淮南子》宇宙起源思想作了剖析。文章

最后又用比较的方法，把《淮南子》与西方宇宙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淮南子》一书中，对宇宙起渡的看法堪与毕达哥拉斯的宇宙观念相媲美，有独到之处。^⑦

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淮南子》不出于一人之手，所以它的宇宙形成论在《原道训》中所讲的，跟在《天文训》和《俶真训》中所讲的，稍有差异，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⑧《淮南子》的宇宙论在许多地方用大胆的去想象去补充科学知识的不足，但是作者所描述的乃是宇宙自身的演化过程，不讲上帝天神如何造物，但它还存在着宇宙有始的观点。有时候理论上一旦出现空缺，就用神话去弥合，例如《天文训》讲到天地日月生成，随即接上共工与颧项争为帝的故事，就是一例。

对《淮南子》宇宙论进行探讨的还有于首奎的《试论〈淮南子〉的宇宙观》，钟肇鹏的《论淮南子宇宙观的唯心主义性质》，顾伟康《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宇宙论体系——论〈淮南子〉的宇宙论》等。

（三）《淮南子》与先秦诸子

胡适在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序》中说：“《淮南王书》，折衷周秦诸子，其自身亦可谓结古代思想之总帐者也。”而且诸子思想并存于《淮南子》中是符合当时学术态势和历史背景的。汉初百家之学，除名、墨未见代表思想的人物以外，各家还有相对的势力，尤其是道、法、阴阳、纵横家言，尚相对的显于汉廷与郡国之间。关于各家在汉初的势力，侯外庐曾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述。^⑨这样的学术大环境必然为爱好术士的刘安提供了聚敛各家思想的大舞台。《淮南子》所承载的思想正是这种学术思想并存的反映，只不过与先秦诸子思想自由言说的生态相比，多了些中和而少了些争鸣。这是政治一统的形势使然，也是文化一统的形势使然。《淮南子》吸取先秦诸子之说颇多，学者多有探讨。

1. 《淮南子》与老庄

《淮南子》最重视《老子》，采摭它的思想最多。清人校定《老子》文句，多与《淮南子》的引文对勘。“道”的概念来自《老子》，《原道训》专予论述。全文对《老子》天道自然无为和道化生万物的思想详加发挥，形成系统的宇宙论，这是全书的理论基础。“无为”的概念来自《老子》，书中反复论述不为物先、以无为用、清心寡欲的思想。政尚简易、“无为而治”乃是黄老治术的核心，也是《淮南子》政论的基点。道德高于仁义的思想亦源于《老子》。《道应训》一篇共引《老子》五十二处，等于用历史为《老子》部分文句作注释。

《淮南子》对《庄子》内篇外杂篇都有所吸收。《俶真训》的宇宙演化论借用《齐物论》中“有始者……”一段文字，

①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淮南王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②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3页。

③ 《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第31-35页。

④ 《齐鲁学刊》，1994年第6期，第84-89页。

⑤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

⑥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淮南王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4页。

⑦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30-33页。

⑧ 冯友兰认为三篇观点很有不同，可参看其《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9页。

⑨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7页。

但有新义。《齐俗训》上承《齐物论》的同异观,将其相对主义改造为承认事物的差别。书中关于人性各有修短,人性和愉宁静,治万物应顺其性、因其俗以达乎性命之情的思想,来自《天道》、《天地》、《天运》、《骈拇》诸篇。养生以神为主形为次的思想,以及豁达的生死观,来自《大宗师》、《德充符》和若干外杂篇。其他对《庄子》的引申发挥还很多,所占比重仅次于《老子》。

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朱锦江《老子与淮南子》、王叔岷《〈淮南子〉与〈庄子〉》、周骏富《〈淮南子〉与〈庄子〉》之关系、周力行《〈淮南子〉与老学》、孙以楷《刘安与〈庄子〉》、邹丽燕《淮南内篇与老庄思想之关系》、丁文宏、蔡友和《老子“无为”思想探微——兼论〈淮南子〉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扬弃》等。这些论文大体上从论道、论政治、论人生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2. 《淮南子》与儒家

《淮南子》引《诗》约三十次,引《易》十余次,又引孔子说《易》者一,自说《易》者一。两引《尚书大传》。书中多篇称颂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赞美孔子的人格和事业,这些都是儒者的老生常谈。《主术训》提出治国必先修身,修身要以仁义为本,这是典型的儒家公式。《繆称训》讲孔子首倡的义利之辨,以明君子与小人之分;又论举贤才的重要。《修务训》通篇发挥荀子《劝学》中强调学习的思想,用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重新解释“无为”,重视后天努力与道德教化。《泰族训》称道孔子和六艺,与《礼记·经解》略同;治国反对苛法严刑,主张以礼乐化民成俗;把巩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宗法伦理关系,当成为政的纲纪。《主术训》、《汜论训》中皆有以仁为经、以义为纪的提法。突出宗法制度和宗法伦理思想,乃是儒学的根本。

张涛在《淮南子易学思想探析》中将《淮南子》认定为汉代易学史上的重要环节,认为它在接受先秦道家之说的同时,继承发展了《易传》的思想成果,提出了宇宙生成、万物起源的理论,体现了《易传》天地人一体观和整体思维方式,强调社会和谐以及天人之间、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整体和谐,发挥了《易传》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改造了原始道家的无为说。张涛还认为,《淮南子》的易学思想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思想一起构成了西汉前期易学的总体格局,清晰展示了当时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势。^①

3. 《淮南子》与墨家

察辩之学中的“类不可必推”和名实关系若干论述,显系受了墨家和名辩思潮的影响。节俭和薄葬的主张来自墨子。《主术训》关于譬师有以言白黑的话,是截取《墨子·贵义》文句。《说山训》关于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的观点,《说林训》关于五行相胜要有数量条件的说法,皆采自墨经。总的说来,墨家思想在《淮南子》中影响较小,比不上在《吕

氏春秋》中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陈广忠《〈淮南子〉与墨家》一文认为《淮南子》中有二十四条关于墨子言行事迹的记述,史实之丰富,评价之公正,在诸子之林中无出其右者。并分别从《淮南子》对墨家学派的组织、人物活动、墨子时代的学派之争等方面给予了考证。^②

4. 《淮南子》与《吕氏春秋》

《淮南子》无一字提到《吕氏春秋》,这可能是作者受到汉初反秦气氛的影响。但我们不能认为这两者之间真正没有联系。两书类同处很多:它们都是由上层贵族亲自主持,招揽众多学者集体写成的。书的结构统一,篇目规整,理事相论。两书作者都要总结先秦各家学说,在推崇老庄哲学的前提下,博采各家之长,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能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为统一的封建帝国提供全面的治理方案。

胡适认为《淮南王书》与《吕氏春秋》性质最相似,取材于吕书之处也最多。“但淮南之书编制更精审,文字也更用气力,的确是后来居上了。”^③

牟钟鉴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思想研究》,把两部性质相近的学术巨著进行了比较研究,对秦汉黄老道家学派的哲学、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熊铁基在《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中将《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同列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以其指导中心思想皆为“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之道。熊氏更进一步将《淮南子》与《吕氏春秋》进行了对比,指出《吕氏春秋》主要从“君人南面之术”的政治着眼,《淮南子》则颇有从世界观或思想上来统领各家的意图。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则主要从社会政治思想上对《淮南子》和《吕氏春秋》的同异进行了比较。葛兆光在《哲理的综合: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中认为:与《吕氏春秋》一样,《淮南子》也试图为思想世界提供一个可以容纳一切知识的构架。但在思想层面上有五点不同。^④

5. 《淮南子》与黄老著作

《汉书·艺文志》中,假托黄帝以为书名的著作目录二十余种,大都失传。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老子》乙本前的《道原》、《竞法》、《称》、《十六经》四篇古佚书,是否即《黄帝四经》,尚无定论,但他们确是流行于汉初的黄老著作。这四篇与《淮南子》在思想上有密切关系。

另外,《淮南子》与法家、阴阳家亦有关系。为君之道在于循名责实,因材施教;群臣守职,百官有常。这是申、韩等法家的一贯主张,以法治国,法不避贵。不以君意行赏罚,

① 《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第96-105页。

② 《孔子研究》,1995年第2期,第33-41页。

③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淮南王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④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4页。

不以私志入公道。不因循守旧，要因时变法，反对贵古而贱今。这些法家的主张，在《主术训》和《泰族训》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他篇中亦随处可见。

《时则训》将《吕氏春秋》以阴阳五行为骨架搭起的世界图式，更进一步发展了。《览冥训》、《本经训》、《泰族训》皆论阴阳气化、天人感应。《天文训》讲人副天数及灾异说。

《精神训》也有类似内容。阴阳五行思想在《淮南子》中所占篇幅不少，但不是其主体思想。

（四）其他理论的探讨

1. 历史观

在历史观方面，《淮南子》提出“事”与“道”一对范畴。“事”是变化的现象，“道”是不变的本质。它从“事”的方面肯定人类物质文明是进化的，也肯定礼仪法度是论世而立、随事而定的，“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①，“法度制令，各因其宜”^②。古制未必都适合于今世，今世之制未必都不善。“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③这些看法与韩非子的历史进化观一脉相承。它又从“道”的方面认为人类精神文明是退化的，赞扬远古时代人类精神的“质真而朴素”。批评近世人性的虚伪败坏。^④

顾颉刚认为《淮南子》的古史观和《庄子》所说的最近，也是把最快乐的时代放在最古的。^⑤同样属于“古史辨派”的胡适，与顾颉刚对于《淮南子》历史观的看法基本一致。它在《淮南王书》中说：“《淮南书》里几乎篇篇有太古圣王的奇迹，无一不是信口开河的假造古史……这是古代学者文人的普通习惯，风气已成，人人信口开河，全不知道这是可耻的说逛了。”^⑥

近几年对《淮南子》历史观进行研究的有齐夫的《〈淮南子〉中朴素唯物史观》、鲁人的《〈淮南子〉社会历史观初探》、张秋升、李伟《〈淮南子〉历史观新论》、汪高鑫《〈淮南子〉历史哲学三论》等。其中以汪高鑫《〈淮南子〉历史哲学三论》较有新意，该文认为《淮南子》的历史哲学含历史阶段论、历史变易论和历史决定论。历史阶段论注重关注和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变易论一方面强调礼乐制度必须与时俱变，另一方面又认为仁义之道万世不变；历史决定论是一种君主决定历史治乱兴衰论，但强调决定历史治乱兴衰的君主必须以无为为本、以民为本。^⑦

2. 法律思想

《淮南子》中的法律思想，既完成了对前代法律主张及其效果的分析总结，又表现出西汉前期封建法律思想的基本特征，同时又保存了十分珍贵的古代法制和法律思想资料。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国锋《〈淮南子〉的法律思想》认为《淮南子》主张法律“因人之性”、“法随时变”；主张兼采儒法、注重“法治”等思想，明显地反映出以道解儒、儒法结合的倾向。这种不拘守于先秦儒墨教条流派的做法，成为后来诸家合流的先导。^⑧

段秋关提出《淮南子》的法律观是“以道统法”：“道”是“法”的核心，“法”是“道”的表现；“道”是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而“法”只是实现“道”的一种手段；“法”的制立与实施，也要以“道”为指导。^⑨

徐复观认为《主术训》中的“法”有四个重要意义：第一，法乃起于众人共同的利益，这是过去的法家所未曾说出的最根本问题。第二，认为法首在于“禁君”。上述两点皆富有现代法治的意义。第三，他们把法与礼仪即道德结合起来。第四，以“法治”为“无为”。^⑩

《淮南子》把仁义礼乐置于法度之上，明确指出，仁义的作用远非法度所及：“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法能杀不孝的人，但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惩处盗窃罪犯，但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它也反映出《淮南子》重视秦朝骤亡的教训，主张采取文、武两手的统治策略，以维护封建统治。

另外对《淮南子》法律思想进行研究的论文还有王应瑄《简论〈淮南子〉的法律思想》、华友根《〈淮南子〉法律思想刍议》、汪汉卿《试论〈淮南子〉的法律思想》等。

3. 逻辑思想

淮南王的逻辑思想，以其丰富的史料，精妙的推理方法，而为历代学者所注目。他对于名家的“辩名”、“巧辩”虽有所批评，但对名家的逻辑思想却有多方面的吸收。如《原道》中说：“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天下为之圈，则名实同居。”也就是说，从物质世界产生后，便产生了名、实，名、实理应浑然一体而能相互协调。《淮南子》中的“名”，强调它要反映自然规律，要和实物相吻合，要体现出概念的严密性。同时要求，不要对“名”人为地加以扭曲，要符合它的本来性。因此特别提出要名符其实：“是故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祸福不虚至矣。”^⑪

“类”是古代逻辑学中关于定名、立辞、推理的基本概念。《庄子》中有“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同类相从、同声相应”等关于“类”的概念。而墨家有“类取、类予”的思

①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9年，第361页。

②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9年，第427页。

③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9年，第426页。

④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8页。

⑤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2002年，第66页。

⑥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淮南王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1-163页。

⑦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1页。

⑧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⑨ 段秋关《〈淮南子〉与刘安的法律思想》，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41页。

⑩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

⑪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9年，第340页。

想,《淮南子》对此都有吸取。如《论言训》:“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方以类别,物以群分。”^①意即搞清事物的类别,就可以进行归纳、演绎的推理活动,从而对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其它《说山训》、《说林训》诸篇中亦有关于“类”及“类属”的阐释。“见窾木浮而知为舟,见飞蓬转而知为车,见鸟迹而知著书,以类取之。”^②“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契其舟楫,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类亦甚矣!”^③“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销金,则道行矣。若以慈石能连铁也,而求其引瓦,则难矣。”^④许多类与类属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有的可“推”,有的不可“推”。可推者,符合逻辑思维的规律;不可推,则是违背自然法则的。《淮南子》对类属之间辩证关系的探讨,对认识世界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董志铁《〈淮南子〉推理论》、蔡伯铭《〈淮南子〉的名实观与推理论》、董志铁《论〈淮南子〉对〈吕氏春秋〉推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周文英《〈淮南子〉的逻辑与方法论》等。

4. 政治思想

对于《淮南子》政治思想的研究首推胡适,他指出《淮南书》的政治思想,虽然处处号称“无为”,其实很有许多精义,不是“无为”一词所能包括。并把《淮南子》的政治思想概括为三个要义:一是虚君的法治,一是充分的用众智众力,一是变法而不拘故常。^⑤

胡氏的“虚君的法治”实际上是其所倡导的君主立宪,这与当年他留学欧洲,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有关。所谓“用众智众力”即民治主义精神,而“变法不拘故常”就是反对崇古。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中专辟一节对《淮南子》的政治思想进行了详细论述。而且其研究角度比较新颖,把《淮南子》与《吕氏春秋》进行比较,得出“《淮南子》的政治思想以《吕氏春秋》为基础而有所发展”的结论。两者之间:第一,他们都主张在统一中央政权下保存分封制;第二,君王要实行“无为”政治;第三,要用众智众力,使各阶层各行业都人尽其用,各的其宜;第四,反对君主个人独裁,主张实行统一法制;第五,为政以怀柔教化为主,刑法为辅;第六,要以耕织为国民经济的本务。两书之异表现在:第一,《淮南子》容纳了亡秦的经验教训;第二,《淮南子》在对待各地民俗问题的态度和政策,被提到重要地位;第三,《淮南子》里道儒两家的政治主张,有些方面进一步得到融合,有

些方面则加剧了对立。^⑥

5. 心理学思想

吕锡琛《〈淮南子〉心理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认为《淮南子》一书中蕴含着弥足珍贵的心理学思想,其主要包括:视清则体宁的心身关系论;“人之性无邪”的人性思想;“因其性则天下听众”的教育心理学思想;恬淡和愉的心理调治思想;“无为”、“修身”的管理心理学思想。^⑦

其他论文有燕国材《评〈淮南子〉的心理学思想》、商汉声《论〈淮南子〉关于神形、知行的心理思想》、高汉声《论〈淮南子〉关于性欲情的心理学思想》、艾永明等《〈淮南子〉中的犯罪心理学思想》、朱永新、范庭卫《〈淮南子〉人力管理的心理学思想》等。

另外,一些学者对《淮南子》的用人观、养生理论、教育思想、音乐理论、民俗学价值等也有论述。在用人观方面,如张祥浩的《〈淮南子〉的人才辩证观》,张维慎、何菊玲的《论〈淮南子〉的用人思想》等;养生理论方面,如管道中《〈淮南王书〉中修善之要旨》、陈丽桂《〈淮南子〉论修善》、王云度《〈淮南子〉论养生》、张运华、何国庆《〈淮南子〉儒道结合的养生论》等;教育思想方面,如陕炳琨《淮南子教育学说》、陈剑昆《论〈淮南子〉中道儒互补的教学思想》等;音乐理论方面,如杨没累《淮南子的乐律学》、周振锡《〈淮南子〉中的音乐理论》等;民俗学价值方面,如曹晋《〈淮南子〉的民俗学价值》等。

胡适以后,从思想上研究《淮南子》的就很多了,我们把这百年来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50年代以前(民国时期),此期的研究比较零碎,除了胡适、杨没累等人的文章外,其余大抵粗俗简陋、无关痛痒,不能切中要害。第二阶段为50年代至70年代,此间的研究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去诠释《淮南子》的思想,同时烙上了当时的时代气息,往往有阶级意识渗透其中。侯外庐的研究便是代表。第三阶段主要是80年代以来,这期间不论全面性提挈全书思想要领,或专门针对书中某一思想论题进行析论,乃至是研讨《淮南子》与诸子的思想关系,都有深入可观的成绩。只是有些文章都有一个西方学术分科的背景和一个同源的学术眼光,尤其是那些以《淮南子》的某某思想为题的文章,更是如此。可以说《淮南子》的思想研究从一开始就纳入了西学的背景。但是,《淮南子》研究的正途是回到《淮南子》的问题和困惑,去寻求解释和答案,而不是以西学为版型把它裁剪成一套现代的衣装。^⑧

①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463页。

②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538页。

③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554页。

④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9页。

⑤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淮南王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2页。

⑥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88-293页。

⑦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十一期,第51页。

⑧ 陈静《淮南子简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124页。

三、《淮南子》的多元解读

(一) 文学特质的关照

《淮南子》之文,《文心雕龙·诸子》评曰:“《淮南》汎採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①认为其华丽之文辞,是隐括了诸子百家文章风格之大概。这与他在思想上以道家统驭诸子是一致的。又刘熙载在其《艺概·文概》中更具体地评论云:“《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②《淮南子》多用历史故实、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古今谚语等,因此其文极奇伟繁富、华赡宏肆。

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说:“《淮南子》以其丰富的古史故实、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为文学描写开拓了新的领域,其连类比喻、奇伟闳丽之文,也开后代散文风气之先。其在文学史上之地位,不容忽视。”^③

张啸虎《论〈淮南子〉的文采》认为《淮南子》“上承先秦诸子的宏辩遗风,下开汉魏辞赋的华章先声,具有独特的文章风格与可取的艺术成就。探讨它,有助于理解秦汉之际文章的递嬗关系。”^④张啸虎还有一篇《〈淮南子〉的文学特色》,认为《淮南子》的文采与文风,主要受道家影响,汪洋恣肆,纵横跌宕;改写优美的神话,艺术性增强;取譬推理,宣染夸张,富有想象力。但形式主义比较严重,充溢大量长篇铺叙,华藻雕饰,可以看作从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过渡形式。^⑤另外,党圣元《〈淮南子〉对于情感与审美之关系的认识》是一篇研究《淮南子》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章。^⑥于大成《〈淮南子〉的文学价值》则就文章、小说、神话三方面去探讨《淮南子》的文学价值。^⑦同类文章还有曹晋《刘安〈淮南子〉的文艺观》、崔希星《论〈淮南子〉的文艺创作观》、刘怀荣《文化一统的自觉追求与〈淮南子〉的文学思想》、曹晋《〈淮南子〉的赋笔特征》等。

另外,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也对《淮南子》的文学特质给予了关注,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即曾论述《淮南子》“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颇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大量排比式的句子,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之先河”。^⑧

以文学内部研究为基础,从不同的视点,如文本的文学性特征、文本的文体特征、文艺思想等作文诠释对象,观照

《淮南子》的文学特质,成为《淮南子》文学研究亟待关注的方向。

(二) 美学价值的探讨

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辟有《淮南鸿烈的美学思想》,认为《淮南子》的美学,“对气象宏伟博大,质朴雄强的汉代艺术的一般特征作了美学的概括,很好地反映了汉代艺术所表现的时代精神”。“《淮南鸿烈》美学上承先秦,下启魏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环节。”并分别从美与自然之道,美的多样性、相对性和客观性,论“文”与“质”,论艺术的创造与欣赏,论形、气、神,《淮南鸿烈》美学的评价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淮南子》对美的认识,都是在论证其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思想时谈到的,因而非常零散而不成系统。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摘选了二十几条《淮南子》中论美的文句。并认为“《淮南子》中的美学观点有彼此矛盾的情况,并未形成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其中大量的道家思想。它对后来魏晋时期美学思想的发展,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⑨施昌东《汉代美学思想述评》认为《淮南子》对美的看法有以下几点:第一,《淮南子》认为天地之间具有天生自在的美;第二,除了天地之间天生自在的美之外,人类也可以创造出自然界所没有的美;第三,承袭了《庄子》齐物论思想,美丑无差别,美丑是相对的;第四,《淮南子》还看到了事物的“美”在其内容与形式上的表现得多样性。^⑩徐春凯《〈淮南子〉的文艺思想——汉初黄老思想在文艺领域的集中反映》、黎孟德《〈淮南子〉美学思想初探》也对《淮南子》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探讨。

综合各家对《淮南子》美学思想的论述,我们认为《淮南子》大致从三个方面对“美”进行了阐释。

第一,美的本质的认定,《淮南子》一方面继承庄子“齐物论”的思想,泯灭美丑差别。如《说山训》:“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求丑则不得丑,不求丑则有丑矣;不求美又不求丑,则无美无丑矣,是谓玄同。”^⑪但另一方面,《淮南子》又承认美的存在,承认美与丑之差别,认为美是事物外在感观、事物内在品质内审美力量的对象化。这才是《淮南子》对“美”这个范畴的本质认定。

第二,审美主体的认识,《淮南子》认为客体能否引起人的美感,决定因素在于审美主体。如《人间训》:“非歌者拙也,听者异也。”另外《淮南子》对审美主体不仅加以区分,而且认为人具有的这种审美能力也是区别于鸟兽的特征之一。

第三,美的形态的认识,《淮南子》以极大的气魄描述自

① 刘勰《文心雕龙》,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05年,第161页。

② 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4页。

③ 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两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5-87页。

④ 《北方论丛》,1983年第6期,第43页。

⑤ 《文史知识》,1985年第7期。

⑥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⑦ 《中央文化复兴月刊》,1982年第10期。

⑧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8页。

⑨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0年,第93页。

⑩ 施昌东《汉代美学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81,第45-52页。

⑪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9年,第531页。

然美的存在，又以豪迈的口吻体会崇高美的存在。

（三）神话传说的研究

《淮南子》中记载的神话传说相当多。但说《地形训》一篇，就有海外三十六国，有昆仑山的宏伟景象，有禹使太章，竖亥步量大地，有禹“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有对九州、八纮、八极的神话性质的解释等等，几乎就是一部《山海经》的缩写。

《淮南子》书中所记录保存的神话材料片断，可资参考的很多，而它对大的功绩和贡献，乃是比较完整地记录和保存了中国著名的四大神话：羿射日除害、嫦娥奔月、女娲补天与共工触山。

四大神话，羿射日除害和嫦娥奔月，先秦时代已有零片记录，如《山海经》、《楚辞》诸书都有所记，而惟《淮南子》所记的，却是比较完整。嫦娥奔月神话，据《初学记》卷一所引，于“奔月”句下，尚有“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十二个字，为今本所无，大约为后人删落了。羿射日神话，据《论衡》所引的《淮南子》，乃是尧自己本人“上射十日”，或“上射九日”，而不是“尧乃使羿……上射十日”。从“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看，似乎说是尧本人为民射日除害，更近情理。^①

四大神话中女娲补天与共工触山，《淮南子》所记，实为首见，气魄与规模，无愧宏伟，是神话的中坚；而此书首次揭出，于保存神话资料，应推许为重大贡献。

刘起釭《古史续辨》说：“《淮南子》一书中，沿袭了不少先秦资料，而主要特点就是蒙上了阴阳五行说毒雾。如在该书《天文篇》、《时则篇》中，承《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之说，把按节令列的那些帝名和神名硬行分配给东、南、中、西、北五方，依次五方的帝是太皞、炎帝（赤帝）、黄帝、少昊、颛顼，五方的佐是句芒、朱明（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等等。于是人间五帝又回到神话中，做了天上五行星之帝，把一些神话中的古神派做了他们的辅佐。高诱注只好把这说成是人间五帝死后托祀于天上这五方之帝。”^②

杨荫深《略谈淮南子中的神话和传说》集中讨论了其中的神话传说成分，认为“其中颇多引用当时的神话和传说，实为研究西汉民间文学的一部很好的资料。”^③龚维英的《〈淮南子〉阴阳之神与两性同体崇拜》也是对《淮南子》神话专题研究的论文，亦有一己之见。^④

《淮南子》中记录保存了很多神话资料片断，其贡献最大的地方就是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共工触不周山等神话。这些神话在整个中国神话传说的演变长河中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同时每个神话的独特性的

又是什么。可以说20世纪的学者基本上从上述两个方面对《淮南子》中的神话作了初步的描述和勾勒，这其中以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和《中国神话传说》为典范之作。但神话本身的研究并不是单纯的文艺学研究、也不是单纯的神话学研究，它必须以世界神话作为广阔的参照背景，同时广泛地借鉴和吸收当代国外人文科学发展中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文艺学中已经广泛使用的方法，对中国的神话进行新的解构与阐释。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哲学》可谓此类研究的滥觞之作，但研究的空间还很大，需要用力的地方还很多。

另外，对汉代音韵的研究，《淮南子》是一部绝好的语言资料。以散文为主，韵、骈、散结合的创作手法，是汉人著述的一大时尚。《淮南子》所代表的南方语言系统，与《老子》、屈赋、《庄子》相近，而与代表北方音系的《史记》等著作，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许多学者曾致力于其音韵的研究。《旧唐书·经籍志》杂家类有《淮南鸿烈音》二卷，何诱撰。而《新唐书·艺文志》载：“高诱注《淮南子》二十一卷，又《淮南鸿烈音》二卷”。现代语言学家罗常培、周祖谟曾作《淮南子韵谱》和发表《淮南子音韵研究》的专文，按照二十一卷的顺序，考察了《淮南子》中的入韵字。这是第一次用音韵学理论对《淮南子》用韵规律进行的探索。

结 语

从宏观上来说，20世纪的《淮南子》研究，前半期主要以文献研究为主，后半期主要以思想研究为主，而近十几年则是异彩纷呈，研究视野更宽泛，态势日趋多样化，学者从美学、心理学、法律思想、教育思想等多个角度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可以说，20世纪的学人对《淮南子》的研究成绩相当可观。再文本研究方面，于版本、校勘、笺释等用力较多，出现了几部集大成性的整理著作，如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何宁的《淮南子集释》等都是《淮南子》整理研究的力作，给后人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对《淮南子》的辑佚，特别是对所得佚文的综合整理尚鲜有作为。

在思想研究方面，研究的主流多集中于本体（道、宇宙、气等）、政治、修养、无为等。但诸如天文、地理、律历等方面，研治者仍少。80年代以来，《淮南子》的研究开始多元化：或以现代学术眼光对《淮南子》各篇所讨论的问题重新为其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或从不同视角对其加以阐释，开辟新的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仍有许多空间以待发掘，比如神话学、修辞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面鲜有人涉及，而在其他方面，诸如美学、文学、哲学史、思想史层面上仍需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加强拓展和探讨。

因此，今后的《淮南子》研究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跨学科研究。《淮南子》本身内容丰富，包罗万象，

① 袁珂《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86页。

② 刘起釭《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页。

③ 《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第1期。

④ 《衡阳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

涉及到哲学、美学、文学、史学等各个领域，因此我们就要相应地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给予论述和阐释。既要在某一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又要综合起来作全方位的解读。所以笔者以为，结合《淮南子》的研究史对《淮南子》给予全方位的系统化的研究，是今后我们用力的目标。

第二，开创研究新领域。很多文章的选题和研究角度较为单调，缺乏开拓创新意识。《淮南子》博及古今，牢笼天地，很多空间和资源都需要我们用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比如可以从历史哲学或政治哲学入手，以《淮南子》的“无为”、“道”、“势”、“利民”等核心概念为线索，探索出《淮南子》独特的思想倾向。另外，在开创研究新领域的同时，应该注意

发掘新的材料，从而发现新的问题。在选用材料时即可以有多种取向：可以集中选择《淮南子》内部的相关材料，可以选择《淮南子》周围与其同时代材料，亦可以选取《淮南子》所引诸子的材料，并重点厘清其学术渊源，以解析其理论内涵。同时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献更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

第三，把《淮南子》作为史料，进而去研究刘安时代的历史文化。历史中的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政治，《淮南子》是由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的集体编纂，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因此，通过对《淮南子》的研究，我们可以窥见汉初儒道两派的历史争斗以及地方诸侯与中央权力的微妙关系。

The Study on Huai Nan Zi in the 20th Century

YANG Dong CAO Shu-ji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scholars reached Huai Nan Zi from different angle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gained a lot of achievements. The author will have a systematic arrangement from a cademic history in this paper, and display features of our age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bout Huai Nan Zi.

Key words: Huai Nan Zi; 20th Century; Academic History

(责任编辑：刘 兵)

沉痛悼念吕绍纲教授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易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孔子基金会前副会长、吉林省孔子学会会长吕绍纲先生，于2008年2月10日凌晨3时因病辞世，享年76岁。

先生1933年生于辽宁盖县，祖籍安徽旌德庙首村。先生一生以教书、著书为业，师承金景芳先生，治《周易》《尚书》多年，合著有《孔子新传》、《周易讲座》、《周易全解》、《尚书·虞夏书新解》等书，自著有《周易阐微》、《庚辰存稿》、《周易的哲学精神》及《周易入门》等，具为解经传史、弘扬国故的巨著，为海内外所推重。

先生为学专注精一，著述颇丰，声名远播海外；为人俭约热心，凡有求助，襄赞鼎力竭诚。